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3 February 201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48、51 和 52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
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2002 年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以及 2008 年
审查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0 年实质性会议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3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6(a)

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
和后续行动：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后续行动

2009 年议会听证会摘要报告

(2009 年 11 月 19 日和 20 日，联合国总部)

大会主席的说明

本文件载有 2009 年 11 月 19 日和 20 日在纽约举行的 2009 年议会听证会摘要，现依照大会第 63/24 号决议分发(见附件)。

* 见 E/2010/1。



附件

展望未来：加强政治支持，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在联合国举行的 2009 年议会听证会：摘要报告

1. 2009 年议会听证会于 2009 年 11 月 19 日和 2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约 50 个国家和 2 个区域议会的 160 多名议员出席了听证会。

开幕词

2. 各国议会联盟(议会联盟)主席西奥本·古里拉布阁下宣布听证会开幕，欢迎各位代表参加会议，并特别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副主席参加联合国和议会联盟的这一联合活动。

3.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议员们在联合国大厅里开展工作并在当地予以落实；议员们关注全球关切的紧迫问题。他要感谢的是，这一天听证会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问题，这一危机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构成威胁，并破坏安全，受到这场危机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最不应该对危机负责的人，即穷人和脆弱人群。

4. 对最脆弱人群困境的同样关切是促使 2009 年 6 月在联合国召开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会议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秘书长要动员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广泛协调方式应对这一经济危机，其中主要关注脆弱人群。联合国系统正在向受危机影响最深的那些人提供额外援助，安排资金和业务能力，根据各个国家的需求制定应对措施。

5. 2009 年早些时候，秘书长呼吁筹集 1 万亿美元刺激资金，帮助阻止衰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20 国集团商定了一揽子实质性的财政支助方案，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每个人都需要有集体责任感，确保将良好意愿转变成有效行动。

我们必须努力听到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声音，使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总体上的决策，特别是参与布雷顿森林机构。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6. 第二个必要因素是通过绿色增长实现经济复苏。2009 年 12 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可以成为促进绿色增长的一个催化剂，投资于绿色行业将增加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的机会。第三个因素是粮食安全。正像秘书长最近在罗马举行的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所指出，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使饥饿的人能吃饱饭，而是让饥饿的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联合国全球粮食危机高级别工作队采取

了切实步骤，既考虑解决当前的迫切需求，又考虑发展可持续粮食体系方面长期努力。

7. 秘书长指出，“我们还需要一起努力，改革全球规范和机构”，因为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是合法性和公众信任的一个基本问题。包容性增长需要包容性机构。必须使几代人之前创建的全球框架和机构更具问责性、代表性、更加有效。

8. 为应对这些挑战，以及需要增加贸易和就业机会等挑战，议员们的持续重视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即将召开千年发展目标 2010 年首脑会议之际。他们的声音对于履行世界对最脆弱人群的承诺至关重要。在危机时刻，迫切需要提高援助资金的数量、质量和可靠性，这是全球协调一致的复苏计划的核心。秘书长最后说，“齐心协力，我们可以走出衰退，实现复苏，走向复兴。”

9. 大会副主席哈迪普·辛格·普里代表大会主席发言，他指出，民主是联合国的核心，联合国所有 192 个会员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民主价值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地区。民主价值是所有致力于提高其公民生活质量的人共享的普遍价值。在法治的基础上，应该采用这些价值指导世界促进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发展，以及尊重人权这联合国三大支柱。

10. 他说，目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使近年来取得的大部分进展受到威胁。危机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饥饿状况，对成百上千万人的生计、福利和发展机会构成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解决这一危机；解决危机需要真正的全球性应对措施。秘书长提到的 6 月份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会议鼓励各国议会联盟为解决危机继续促进制定全球性应对措施。为有效解决这一危机，各国议会承担着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令人鼓舞的是，这么多议员聚集一堂，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同时从联合国真正的多边环境中考虑问题并从中受益。

11. 各国议会联盟主席西奥本·古里拉布指出，本次会议的出发点可能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即我们这个星球上居住着有能够体面生活的人和不能体面生活的人。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代表着穷人，见过穷人，而且为穷人的事业奔走着。无论过去将人们区分开的是政治差别还是意识差别，但今天最大最明显的区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

12. 有迹象表明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推动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体发展的力量可能比预想的要强。但在世界许多地方，灾难依然存在，而且短期内不会消失。就业危机刚刚开始，无论在富国还是穷国都是如此，每天为填饱肚子四处奔波的人数激增。即使经济的确正在复苏，但是经济还未创造就业机会。失业攀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13. 与此同时，世界正在努力解决粮食危机问题，这一危机不仅是生产问题，而且是分配、质量和可及性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使世界上成百上千万忍饥挨饿的人能填饱肚子。粮食无保障和气候变化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两大危

机。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必须达成协议，他还呼吁在座的所有议员向自己国家的部长游说，确保达成协议。

一面谈论经济复苏，一面破坏我们的地球，这是毫无道理，很不明智的。

西奥本·古里拉布

14.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世界可以有1万亿美元用来帮助去年要倒闭的银行机构，却仅有相当于上述金额极小一部分的资金用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议员们应思考这些扭曲的现象，并帮助人们认识到事实上的真相以及本来可以做到什么。议员们的任务是将人民的声音带到联合国，并将联合国的信息带给人民。

第1次会议：全球应对危机措施概况

专题讨论小组成员：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助理秘书长乔莫·夸梅·孙达拉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和审查部新兴市场司助理司长 Lorenzo Giorgianni；卢森堡常驻联合国代表兼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西尔维·卢卡；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埃伯特基金会)执行主任 Werner Puschra(主持人)。

15. 现将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关于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措施的讨论情况概述如下。乔莫先生回顾了使世界陷入目前困境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缺点，Giorgianni先生介绍了基金组织的应对措施，卢卡大使回顾了经社理事会在应对危机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Puschra先生就有关改革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发表了意见。

16.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一直未制定一个发挥应有作用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几十年来缺乏充分、适当的金融规管。应对目前危机的许多政策措施杯水车薪，而且在某种程度实行的是双重标准。

17. 过去三十几年来的金融全球化并未实现资金从富国向穷国的净流动，而是恰恰相反。短期资金流动产生的问题尤其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化和无节制消费。造成的结果是不稳定性加强，增长放缓。虽然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未像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一样严重，国际贸易可能不像那时一样急剧下滑，但是出现了新形式的保护主义，例如金融壁垒和限制移民。

18. 许多国家经济复苏受阻，原因是刺激方案产生效果滞后，而且投资复苏并不能自动转变成就业机会复苏。此外，至少是直至2009年，基金组织关心的是确保财政平衡以应对危机，这尤其制约了发展中国家更强有力地应对危机。亟需进行系统改革，对于当年通过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决的许多问题，现在也需要重新审视。但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监管制度进行改革依然存在阻力。

19. 基金组织早就认识到，这场危机具有全球性，需要采用全球解决办法。因此，基金组织率先为那些有回旋余地的国家制定了一项协调性财政扩张政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2%），与此同时，基金组织与其他多边捐助方一道竭力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充足的资金，使其能够制定适应性强的各项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

20. 为此，基金组织的借贷资金增加了两倍，并以特别提款权的形式向全球经济注入了约 2 800 亿美元额外流动资金，其中约 1 000 亿分配给了发展中国家。基金组织还加紧开展紧急融资活动，到目前为止承诺资金超过 1 700 亿美元。此外，基金组织全面修订了针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借贷机制；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保险机制，对于那些政策记录良好的国家无附加条件；减少了附属于传统的待命贷款安排的政策条件的过多干扰；提高了可提供的非优惠贷款金额；并允许使用基金组织资源填补预算赤字。优惠贷款大幅增加，而且 2011 年底前，基金组织将向低收入国家提供零利率贷款。

21. 与过去危机不同的是，获得基金组织方案支持的国家能够避免利息和汇率的大幅波动，因此可以将对家庭和公司的金融费用降到最低。基金组织支持的方案还促进采取各项措施，以保护、甚至增加在社会安全网方案方面的支出。与过去危机相比，总体上利率较低，部分原因是避免了因货币贬值造成的大幅通货膨胀。而且，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帮助克服经济衰退的同时，辅之以各项措施解决银行流动资金需求，保护银行存款。

22.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过去相比，这些方案在行政和立法上更加支持国家当局的自主权。各国当局在汇率机制或资本控制方面作出的政策选择总体上得到基金组织的尊重，附属于贷款的政策条件仅限于与重要的波动领域，例如银行重新资本化以及为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而进行的改革。

23. 全球危机是对基金组织职权范围的一次考验，基金组织通过改革其借贷方式，迅速筹集了大量一揽子应急资金，从而能够快速进行应对。但是，现在的风险是，如同亚洲危机之后的情况一样，各国可能会决定储备外汇，进行自保，以预防出现资金流入突然中断，并避免下次发生危机时不得不向基金组织求助等情况。这会加剧了全球不平衡，造成新的不稳定。因此，基金组织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能够进一步加强其融资机制，使各国能够将其视为替代自保的一个可靠机构。

24. 但是，如果不提高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其开展的任何改革都不会取得成效。因此，在最近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上做出的一个决定是加快配额调整工作，在 2011 年 1 月底之前，将一些配额转给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25.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部，主要有三个促进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论坛：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举行的高级别特别会议；年度部长级审查；发展合作论坛。2009 年高级别会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供开展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讨论经济危机对发展的影响、包括与国际金融架构和全球经济治理有关问题。会议强调迫切需要以连贯、协调方式应对这一危机，解决加强发展筹资后续行动问题，确保落实在《蒙特雷共识》和《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言》中做出的政策承诺。

26. 2009 年年度部长级审查帮助确保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依然重视落实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将于 2010 年 7 月举行的第二次发展合作论坛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论坛将特别关注发展合作、南南合作以及三角合作中的相互问责问题，以及援助管理方式一致性问题，以促进其他形式的发展筹资。

27. 六月会议授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另一项任务涉及劳工组织一项题为“危机后复苏：全球就业契约”的举措。而且，六月会议的成果文件还包括经社理事会的其他三项重要任务，即促进联合国发展系统协调应对危机；审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间协定的执行情况，以加强二者之间的合作；以及就有关设立危机问题特设专家小组的可能性及其对发展的影响向大会提出建议。

28. 由于在金融领域过度冒险，源于美国的这场危机甚至影响到了遵循完善经济政策的经济体。因此将不加管制的全球化的消极一面暴露无遗，即期危险就是严重动摇了对市场本身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信任。一揽子刺激计划和拯救政策已经帮助将世界经济从悬崖边拉回，但现在需要不仅着眼于揽子刺激计划和拯救政策，而是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对国内和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民主改革。

29. 对于任何增长政策而言，金融行业都是关键，因为其基本职能是收集存款，将其用于生产性投资。近年来，由于扭曲的刺激系统以及缺乏一个有效的框架监管金融行业的行为，致使金融行业基本忽视了这一职能。现在，大家清楚地看到，金融机构事实上是公共机构，因为只要这些企业足够大，国家最终将确保这些企业的生存，因此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全球性监管机制，以避免再发生如此规模的危机。全球经济系统如此重大的改革需要从国家到全球层面的政治支持，这也是各国议会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30. 这场危机还显示出，过去 30 年来基于放松管制、私有化以及一切交给市场的宏观经济思维是完全错误的。正是由于缺乏监管，才导致衍生证券等有毒的金融产品使得成千上万人失业，陷入贫困。

31. 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需要制定一个透明、民主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化过程的步伐已经超过了管理全球化必需的政治机构的发展速度。全球市场需要全球性政治框架和机构。朝建立此类全球性机构方面迈出的一个步骤是出现了一个 20 国集团，这是政府首脑级别的峰会，而不仅仅是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出现这一集团是因为主要国家政府认识到需要加强全球合作和规管，但这一步迈得还不够大。20 国集团有两个缺点：20 国集团是自封的，缺乏

合法性。新加入的一些成员国抱怨该组织的内部工作机制不透明，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加入。

32. 治理不仅仅是决策方面的一套规则：治理涉及推行的政策、为哪些利益服务以及平衡影响治理的显性和隐性权利关系。现在需要的是在全球实现团结，同时实现资本和贸易的全球化。这场危机暴露出许多国家的安全网有缺陷，世界上 80% 的人口未获得适当的社会保护。为应对迫在眉睫的失业和贫穷危机，各国政府需要制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创造体面就业机会，而且各国政府需要将社会保护和社会服务扩大至所有人，要实现这一点，据劳工组织的计算，需要花费约 3% 至 10% 的国内生产总值。

33. 各国议会应该发挥作用，就这些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并推动必要改革。但是议会和政治决策者需要认识到，反对重大变化的政治阻力很大：在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已经花费了约 3 亿美元游说国会，反对加强监管。

讨论情况

34. 在之后的互动讨论中，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场危机暴露出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加剧了不平等、贫穷以及不公正；金融危机加剧了之前的粮食和能源危机；造成国际贸易放缓；对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构成威胁；而且危机造成的困境和日益不公平甚至可以威胁到已经非常脆弱的民主机制。发达国家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并采取各项措施，消除这场危机造成的影响，但是若干代表对于这些国家是否认识到了他们有这些责任表示怀疑。

35. 与会代表同样广泛认为，直至最近，基金组织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贷款的条件已经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主要是使这些国家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造成的结果是工作机会丧失，贫困加剧及更加不安全。必须消除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双重标准：发达国家不能继续采取禁止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做法。非洲国家成了欧洲和美国互相设置关税的附带受害者，而且贷款条件强迫非洲国家大幅度降低关税，结果在非洲市场上，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比非洲国家自己当地出产的农产品还要便宜。

36. 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消除最不发达国家的困境，特别是通过无条件免除外债以及通过免税和免关税措施帮助这些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

对于最穷的人而言，也许最糟糕的情形还在后面。

巴基斯坦参议员 Muhammad Humayun Khan

37. 关于一些国家希望储备外汇，进行自保以应对今后发生此类危机问题，有人解释说，此类方法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挤掉了本可以用于社会和基础设施的

资金。在危机情况下，理想的做法是向基金组织等最终借款方求助。但这也就意味着基金组织必须确保其借贷机制不会阻止各国向其借款。这还意味着基金组织必须有足够的借贷资金，在此方面，议员们支持增加基金组织的资源非常重要。

38. 议员们还提出了下列几点要点：

(a) 危机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发展中国家对触发危机没有责任，因此不应让它们独自面对危机的不利影响。这样做的话，就等于不向问题的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手段，只是要求它们自己出钱来解决问题。目前似乎正在出现的经济恢复非常脆弱，必须在政策的各个层面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加以维持，以确保经济恢复能保持下去，从而创造就业，而不仅仅是增长；

(b) 不能将危机当作发达国家对其承诺弃之不顾的借口，尤其是拨出国内生产总值的 0.7%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以及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提供免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的承诺。同时，官方发展援助仅可作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必须避免形成依赖的文化；

(c) 美国和欧洲取消有损于非洲市场的不公平的农业补贴，这对全球经济的恢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d) 保护主义可能是一些国家对危机作出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在面对不同寻常的高失业率的时候，但必须认真评估其对国家和全球经济的最终影响。目标应是努力实现更加开放的全球经济；

(e)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虽然促成了危机的发生，但这一状况不可能迅速改观。就中期而言，或可寻找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的备选办法；

(f) 这场危机揭示的许多问题是长期的，已就有关纠正办法再三进行过讨论。不过，现在需要的是具体行动，特别是深化对布雷顿森林机构治理持续进行的改革；

(g) 这场危机可能是采用创新性发展筹资机制的一个契机，例如可以实施国际货币交易税和搭乘飞机税或者设立基于资产风险类别的稳定基金。这些办法不仅可以协助为发展筹集资金，而且也可以抑制投机；

(h) 20 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兴起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该集团没有充分代表发展中国家；最贫穷的最不发达国家被完全排除在外。

第 2 次会议：实施绿色恢复：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的办法

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哈迪普·辛格·普里；世界观察研究所全球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兼主任迈克尔·伦纳；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院长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英国议会福祉经济学小组 Jo Swinson 议员(主持人)。

39. 在讨论实施绿色恢复问题时，普里大使谈到了经济危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伦纳先生介绍了绿色恢复实际含义的一些技术因素；斯佩思教授和 Swinson 女士均探讨了改变衡量经济是否成功的方式的必要性问题。

40.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与气候变化问题是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为了使气候变化的解决办法得到普遍接受，这种办法必须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历史上的责任与因果关系方面。还必须确认加快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必要性，并且始终保持公平。

41. 开发和传播绿色技术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要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问题能否以可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此类技术的问题，而这需要找到一个能利用知识产权体制中的灵活性的解决办法。

绝不能放过一场好的危机而不予利用。

白宫办公室主任 Rahm Emanuel

42. 迄今对全球危机的应对一直是侧重于通过一整套刺激措施恢复经济增长。虽然有人对刺激措施的绿色程度表示关切，但有人指出，这些仅仅是在经济危机时采取的临时措施，不应被视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办法。其实，有必要侧重于如何使工业界和消费者参与进来，执行绿色措施，而这就需要尤其是发达国家改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各国议会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向其选民解释为什么需要紧急采取行动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拟订制止气候变化所需的政策奖励措施，确保这些无可避免的变革得到普遍接受。虽然发展中国家明白它们也需要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助下采取行动，但所有各方都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情况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43. 可将这场危机看成是执行困难的或不可能实施的措施的一个良好契机，以此一道解决经济危机和气候危机。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对在这些工作上取得巨大进展有很高的期待，但现在人们感觉国际社会可能达不到这些期待。全世界的刺激支出总额中仅有 15% 可以某种方式被界定为绿色，这一比例在欧洲和北美尤其偏低。绿色“新政”将基本上仍然是一种愿望，还是可实际转化成为一整套有意义的政策和变革，这个问题仍不明朗。

44. 全世界为这样的观念所吸引，就是可以依靠市场工具来做艰难的政治工作，采取少数奖励措施，对工商业界发出呼吁，就将会解决问题。但是此类工具只有在具有远见的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框架内才会奏效。而这又需要领导人和议会具有政治勇气，拟定出应有的公共政策。各国政府必须进一步订立雄心勃勃的任务和标准，以便推进绿色创新进程。

45. 除其他外，这将包括：交通运输模式和网络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以更有效的方式组织电力系统；聪明的电网；更有效的输电线路；更为接受可再生能源强制上网。在技术上需要实现跳跃，而不是些微的改进。即便只是将已知的最佳做法运用到现有工业，也将带来巨大的改进和节省的潜力。简而言之，这个世界必须寻找各种办法使产品更经久耐用、更易于修理：如果我们继续那种动辄就扔掉的文化，我们就只会在原地打转。有必要将经济重点从无休止的产品销售转到服务销售，从而减少资源开采和对环境的影响。

……这种政治经济模式为少数人创造了大量财富，造成大多数人贫穷，为所有人造成了隐隐出现的环境灾难……

詹姆斯·古斯塔夫教授

46. 很明显，气候危机的严重性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许多人认为，将气温的升高幅度限制在摄氏 2 度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这个世界在本世纪内肯定会升高 4 至 6 度，并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但政治领导人还没有勇敢地面对危机。同时，世界存在着持续的大众贫穷、巨大而且在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隐隐出现的缺粮缺水问题，所有这一切现都因肆无忌惮的金融操纵和投机以及美国和其他政府没有对金融和其他部门进行适当管制造成的世界衰退而更加复杂。

47. 要共同解决这些危机，如果只是继续采用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运用的工具、方式和政策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改变世界经济运作系统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承认当前的发展模式正导致世界直接走向全球灾难。我们必须尽早放弃这一模式。有许多良好的有益模式需要研究，但首要的问题是：如果经济不是为了增进各个方面的人类福祉的话，那么经济又是为了什么呢？斯佩思教授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持续的经济，一个不是以今天的优先目标，而是以供养人、维持这个星球、维持就业和社区为头等优先事项的经济。但是，除非我们超越现有的国民收入账户体制以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迷恋，并制订新的社会福利指标体系来指导我们的社会，我们就绝不会找到正确的道路。对于我们是否在取得成功，现有的指标正在给我们非常错误的信号。”

48. 目前的消费和预计的人口增长彼此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个事实，需要人们研究他们真正重视的是什么。英国 25 年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现在的五分之一，但现在的生活满意度却已经下降。这一研究结果符合伊斯特林悖论，就是在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之后，更多的收入实际上并不能使人更幸福。

49. 现在人们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消费已经却已失去了控制，因为消费被始终认为是件好事。人们不断受到媒体和广告宣传的压力，要求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和更多地消费是有代价的，不论是健康代价、人际关

系代价或环境代价，但是这些代价并未被计入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找到一些新的工具来衡量实际的幸福和生活的满意度。

50. 虽然有关低增长的论述目前尚不适用于人均消费较低、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远远低于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仍须留意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可以开始采用可负担得起的解决办法。

51. 经济衰退是重新思考的一个良机。虽然，发展中国家明显需要增加其经济产出来提高生活质量，但对这一说法适用于发展的每一阶段的观点，现在却是提出质疑的时候了。在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社会中，应将不断增长的生产率转化为减少工作时间、有更多的休闲机会、更多的社区活动和家庭生活时间，而不是获得更高的工资和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

讨论情况

谁应做出牺牲：是一无所有的人，还是生活在肆意浪费的经济中的人？

阿尔及利亚议员 Abdelkader Cherrar

52. 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一些议员介绍了各自的国家为降低碳排放和促进可再用废品的再循环正在开展哪些工作。

53.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绿色经济需要人们作出牺牲，但对于如何承受这一牺牲、尤其是由发展中国家人民来承受持有许多不同意见。显然，较少地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尚不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许多代表都认为，气候变化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因此发达国家在道义上拥有纠正这一状况的责任。不过，全球升温导致的气候灾难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因而减轻了后者采取行动的压力。但如果首先导致这一问题的发达国家不采取多边行动，单个的发展中国家将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

54. 有些发展中国家即便认识到它们同样需要协助转变为更绿色的经济，但同时认为，它们需要大量财政援助才能这样做。一些与会者提议免除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认为这将释放出资源，使它们能支付更为绿色经济的部分必要费用。

55. 还有人指出，尽管所有国家都认为必须做些事情，但每个国家都在等待其他国家首先作出承诺，这肯定会导致停顿不前。如果一些国家不准备采取行动，其他国家就应撇开它们，自己继续向前迈进。尴尬和公众舆论的力量很快就会迫使落伍者赶上领先者。在这里，议员们有责任呼吁各自的政府采取行动。所需要的是强调共同的惠益，而不是归罪于哪一方。

56. 以不同方式行事的技术可能性是巨大的，但旧的工业化国家也有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它们认为沿用现有的经济运作方式有好处。必须制订措施，使工人及

其社区放心，经济不会突然停滞，将通过不可避免的变革来帮助他们。事实上，南方一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较低，这对这些国家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实现其显然应享有的发展进程中采用绿色解决办法，而不是非得重复北方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所犯的相同错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复制了一直在影响发达国家的许多相同的消费模式，例如过度依赖轿车的使用。必须采取措施来避免这一点。

57. 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在太多的国家，人们为维持生命而奔忙。议员们必须传播的一个讯息就是，归根结底，能源效率无论如何提高，都跟不上不断增加的消费；必须克制消费本身，而不仅仅是为实现更为绿色的产品而进行改良。发展中国家也要留意这一问题，并开始采用可负担得起的解决办法。例如，小额信贷就产生了良好效果。

58. 有一个重大的选择必须要做：要么继续维持现有的经济和社会模式，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等作出调整，要么与现有模式完全决裂，转而采用促进大众福祉的经济，放弃“多即为好”的信念。

59. 议员们强调下列观点：

(a) 协助发展中国家踏上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将需要发达国家在财政和技术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须始终成为政策的依据；

(b) 转变成更为绿色的经济将需要承诺改变生活方式。能源效率无论如何提高，都跟不上不断增加的消费；必须克制消费本身，而不仅仅是为实现更为绿色的产品而进行改良；

(c) 变革的动力不能仅来自于政治领导人：必须提高公众对迫切需要采用新方法的认识。与此同时，需要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但这种办法不足以将我们推进到绿色经济：公共政策的作用十分重要；

(d) 防止全球升温的政策措施——例如改善房屋的隔热和能源效率——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因而对摆脱经济危机也有帮助；

(e) 应为大学从事可再生能源研究提供更多的奖励；

(f) 联合国应制订国民账户的其他指标，以衡量经济表现，确定经济是否真的有利于人民、社区和自然环境，真的有助于幸福和满意度。国内生产总值不应作为人类进步的主要指标。

第 3 次会议：处理危机的社会影响：安全网、公益物和工人权利

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南非国民议会议长马克斯·西苏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民主治理小组主任杰拉拉丁·弗雷泽-莫勒凯蒂；危地马拉常驻联

联合国代表格特·罗森塔尔；南方中心主任马丁·科尔；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非洲发展方案主任查尔斯·阿贝(主持人)。

60. 在审议危机的社会影响时，西苏鲁议长从南非的角度对危机做了评论，弗雷泽-莫勒凯蒂女士谈到了在法律上增强穷人的力量，罗森塔尔大使介绍了危机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影响，科尔先生提出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一些创新性思路，阿贝先生谈到社会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61. 目前的动荡将关于政府应如何妥善应对经济危机的旧有论争又推到了显要位置。今天，很少会有经济学家争辩说，政府不应实行干预来支持经济活动：论争的主要核心问题是如何制订一套适当的政策，应对因金融部门的贪婪和无能导致的、以最近几十年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劳工市场放松管制的政策为背景产生的危机。这些政策造成的影响——工资停滞不动、社会保护遭到削减、工人权利被侵蚀——都证明了这些政策的失败。

62. 全球金融危机和衰退对南非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挑战，经济萎缩了 1.9%，税收减少，借贷增加，预算赤字加大，对各项社会方案造成了更大的压力，2009 年上半年的总就业率减少了 3.4%。2009 年 2 月，政府、工商界、劳工和社区代表拟订了一项协议，以设法减轻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该框架的一些主要内容包括：采用反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以支持经济活动；扩大公共投资方案；鼓励在当地采购用品和服务，以支持就业；实施各项战略，以协助较为脆弱的部门；拟订投资奖励措施，以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63. 南非还实施了范围广泛的一整套刺激方案，其中包含经济和社会构成部分，包括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补助办法；以及深层的、意义深远的储蓄和重新调整优先目标的工作。此外，政府允许减少税收，并且首次进行借贷以保护公共支出。

64. 议会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办法是监督政府为减少危机的影响而采取的行动，确保执行现行最佳的经济政策，协助他们所代表的人民改善生计。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议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以通过强有力的积极努力来确保政府保持问责，对社会中即便是最脆弱的阶层作出反应，改善公众对议会的看法。

65. 在法律上增强穷人的力量基于将贫穷界定为缺乏权利、保护和机会的一种发展方式。穷人往往在恶性的贫穷处境中受到忽视，因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进程没有保护他们的经济权利。因此，增强穷人的力量的前提是采用综合性方式处理贫穷问题，这一做法将法律和人权的基本要素同有关奖励和市场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它还大力强调生计权利，并寻求促进融合与人的发展。

66. 在法律上增强力量议程极为重视经济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如何促进减贫，因此得到了热烈的政治反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财产、劳工或创业权利等问题可能

非常敏感，但如果在公平和效率的背景下推出，对增强力量的政策改革的政治阻力就会大大减少。

67. 目前的多重危机也具有政治影响。随着各国寻找应对其社会经济挑战的办法，它们需要确保利用这个机会推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治理层面所需的变革，以便对穷人在世界各地面临的现实问题产生影响。实施所需的调整将能确保始终保证实行多边主义，联合国能发挥它应有的中心作用，并由开发署具体注重处理发展议程。

68. 在本千年初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经济增长一直不甚理想，贫穷发生率仅有所缓慢下降，收入分配要么恶化，要么停滞不前。这种状况反映的是依赖市场的经济模式，它惩罚了最没有能力维护自身的部门。它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种排斥性模式。

69. 然而，2000至2008年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支出明显增加，产生重大影响。因此，2001至2008年期间贫困率从44%下降到33%，同期极端贫困率从19.4%下降到12.9%。同时，增长率也有了提高。虽然增长幅度并不惊人，但是已经足以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作用。因此，在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中，收入分配情况有了改善。

70. 本世纪头几年大大偏离了以往的趋势，明显反映出公共政策的影响，与让市场发挥其所谓神奇作用的做法形成了对比。新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度增加整体公共支出，这可以大量增加财政收入，并增加政府向卫生、教育以及保护最脆弱者等社会领域分配的支出比例。

71. 但是，在2008年上半年，随着化石燃料价格急剧上升，导致大部分基本食品的价格同样暴涨，这八年的积极趋势开始失去势头。这双重危机对人口中较贫困阶层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2008年极端贫困率又开始上升。接踵而来的打击是发生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信贷紧缩，来自国外的家庭汇款急剧减少，对公共支出的财政限制收紧。因此，公共政策不得不发生偏移，从促进逐步实现繁荣过渡到挽救民众不致陷入贫困。但是，矛盾的是，在最需要公共干预措施之时，公共部门却面临最大的制约因素：金融危机对财政收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大大制约了政府采取公共干预措施对付危机的能力，如果各国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援助，那么，这些机构规定的某些条件会加剧财政收缩现象。

72. 在目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是避免新的债务危机，许多最贫穷国家终于开始摆脱现有的债务危机，但现在基金组织估计，一些发展中国家再次濒临于无力偿债的边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提议在危机结束之前让这些国家暂停偿还债务，这同允许中美洲遭受飓风和台风的国家或亚洲遭受海啸袭击国家暂停偿还债务的做法相似。

73. 更为重要的一项建议是建立一个国际债务仲裁机制。贸发会议、基金组织秘书处和 77 国集团及中国已经采用各种形式提出这个设想。建立这种机制的目的是视需要尽快、而不是在多年之后进行债务重组。发生上一次债务危机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曾不断借贷新的资金来偿付旧的贷款，这个周期持续了二十年，直到债权人意识到这一过程不可持续，最终创造了减免债务的机制。

74. 债务重组机制的建议源于破产法原则(这体现于若干判例)，即可能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请，要求暂停偿债。法院将委派一个审计事务所审查该国的情况。债权人将汇聚在一起，拟定出一个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至少向债权人偿还部分欠款。这样，该国摆脱了债务，重新具有活力，就有资格申请新的贷款，而债权人也产生信心，相信该国至少不再背着旧债的负担。

75. 譬如，前不久，阿根廷单方面调整自己的债务，告诉债权人，将会按照阿根廷自己认定的市场价值偿还债务。这在世界各地引起了愤怒的反应，但是，在阿根廷采取这一行动之后，许多债权人表示愿意提供新的贷款。同样，马来西亚最近规定暂停还款一年，因此，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受危机影响的其他亚洲国家，几个月后，债权人重新回来了。这些经历告诉我们，应该制订一个正规的债务重组机制：各国不应该需要自己采取行动。

扩大社会保护的覆盖面不仅是一种道德责任，也是一种正确的经济学……在经济减速时，必须重视社会保障和投资，以便刺激国内需求，减少脆弱性。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Charles Abbey

76. 当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爆发点与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但产生的影响是相似的，特别是在社会方面。原本在泰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演变成整个亚洲区域及更广泛地区的经济危机，后来又形成社会危机。金融危机很快造成该地区许多国家的生产和就业发生急剧收缩，进一步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和失业率上升。货币实际贬值导致进口价格上涨，降低了家庭收入的购买力。

77. 和当时一样，现在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人权最没有得到促进和保护的人。移民和妇女工人往往首先被解雇，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最容易受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类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最低，因此更容易解雇。其中许多人是外国妇女，被驱逐出境，为的是要减轻东道国自身的失业问题。此外，从正规工业部门失业的工人往往进入农业和非正规服务行业，从而降低实际工资。这类人员缺乏教育和可转化的技能，即使经济反弹后，他们也最难重新就业。

78. 移民汇款减少是经济衰退的另一个后果。有证据表明，有些家庭出售生产性资产，如土地和牲畜，因而变得更加脆弱和贫困。还有报告显示，贫困家庭让儿

童、往往是女孩辍学，让他们在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工作，补充家庭收入。这种做法延续了贫穷的世代相传。

79. 正如 1997 年的情况一样，目前的危机表明需要有机体和机制来帮助家庭管理风险，并在发生新的危机之前，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讨论情况

80. 下文力求详细探讨国际债务重组机制的概念。虽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构想，但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如发现某一国家拖延还款，甚至在使用贷款方面不诚实，应采取何种立场？发言者建议，一旦审计师依照商业规则确定某一债务已无法偿还，就必须解除债务，使得该国获得活力，说服债权人重新放贷。

81. 发言者建议，社会保障对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大作用，可以在平等、安全和尊严的条件下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从而实现减贫。人力资源的发展是全面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特别重视通过教育来打破贫穷的世代循环。

82. 亚洲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非洲，其原因之一似乎是直到前不久，亚洲并不需要寻求基金组织的保护。基金组织禁止非洲采用某些政策，但这些政策却依然是亚洲的标准做法，亚洲通常都设有产品推销委员会，用关税来保护自己的产品对付外部竞争，并有其他措施。外部规定的错误政策制约了各国的发展和增长。

83. 许多发言者探讨了经济危机产生的种种深远影响，包括失业导致家庭收入大幅减少，以及移民汇款减少，导致社会危机，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失业、工人焦虑不安、营养不良、婴儿和产妇死亡率上升以及人们因没有经济能力而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燃料造成环境退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甚至会导致政局不稳定和崩溃，因为心怀不满的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会被心怀叵测的政客操纵，破坏善政和民主。它甚至会导致较富裕国家看到这种动乱后，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理解或不赞同法治，为帮助他们走上民主道路而捐助的金钱会付之东流。但这种看法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贫穷国家的政局动乱，是富裕国家所推行的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

84. 有人提出问题，即如何确保政府公布的方案能付诸实施，如何确保将援助品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利用监督和会计模型来要求政府对议会负责，并确保预算编制过程公开和透明；对政府方案进行年度审查；议会有权修改预算（最近南非已经实行）；与当地民众会面，听取他们对当前问题的意见；让广大民众到议会发表意见；建立青年议会和妇女议会。

85. 讨论中产生了以下几个要点：

(a) 积极主动的公共政策是建立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关键，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没有这种安全网。这样做必须进行改革，要增强穷人

的法律能力，使穷人能够最终取得土地所有权、财产权以及设立和经营企业的其他这类权利；

(b) 要支持社会政策措施，就必须超越目前的“损害控制”的模式，并注目于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整个局势。美国将不再是世界上可以最后依靠的消费者。美国的储蓄在不断增加；必须在经常账户有盈余的国家寻求新的市场；发展中国家需要关注增加国内和区域的需求。若要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需求，就需要审查根据过去达成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所制订的贸易政策。议会经济或贸易事务委员会应该关注这些问题；

(c) 当前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对各国支持安全网和工人权利的能力产生直接影响。基金组织规定的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部门产生了破坏作用，因而也就对社会方案所依赖的收入造成了破坏；

(d)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拟议对配额安排进行的改革微不足道，不足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两个机构的社会决策活动。配额改革必须被视为是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进程开始，而不是终结；

(e) 对于公共政策需要采用三方参与的办法，使政府、工会和企业家共同谈判社会方案 and 产业政策。在没有采取这种做法的地方，议会应帮助促成这一做法。

第 4 节：增强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和问责性

专题讨论小组成员：美国国会众议员 Gregory Meeks；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 Jorge Argüello；世界银行主管对外事务副行长兼业务通讯主任 Peter Stephens；全球金融新规则联盟执行主任 Jo Marie Griesgraber(主持人)。

86. 在讨论危机的这一方面问题时，Meeks 议员阐述了美国对这场危机的看法，Argüello 大使报告了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联合国会议的结论，Stephens 先生从世界银行的角度阐述了一些看法，Griesgraber 博士就国际金融机构的问责制提出了一些看法。现将他们的发言综述如下。

87.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揭示了美国金融市场已基本破裂和不平衡的状况，因此，改革也必须从美国开始。但与此同时，改革还必须是一个更广泛的全球协调努力的一部分，主要着眼于系统性风险的危险。美国正在迅速采取行动，推动一揽子改革，从根本上改组其金融体系。它在起草和批准将成为一个更好、更稳定但又依然具有竞争力和能够创新的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88. 虽然美国的金融公司在全球仍然占有领先地位，美国市场仍然最有竞争力，最具创新性和最有吸引力，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表明，监管不足会导致系统性风险，而且会跨越国界蔓延，其速度出乎任何人的想象。由于担心制订比其他国家更严格的监管标准会引起监管性外逃，导致其最著名的金融公司迁移境外，

因此，美国的监管架构无力应对这样严重的金融危机。监管性外逃和国际上竞相追求最低标准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美国正在迈出大胆的第一步，改革美国金融体系，对在其市场上运作的公司实施更高的标准。美国这样做，正是要确保世界上不发生为少数人创造极大财富、摧毁和破坏全世界大多数人财富的极端性金融动荡的局面。

89. 美国目前改革的目的是要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所有交易，而那些冒风险的人要有能力承担这些风险的全部代价。这就意味着要大刀阔斧改革衍生工具市场，对金融机构提出更高和更严格的资本要求，消除监督方面的重大缺口，并建立新的结算和清算框架来管理任何金融公司缩小业务的工作，而不论其性质、规模和相互联系，而且由该行业自己、而不是纳税人承担费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联合国会议向前迈出了一步，确认这场危机产生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并开展合作。讨论会产生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必须在一个对称的原则基础上重新设计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让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公平分享国际经济关系中产生的利益和义务。同样明显的是，有必要采用适当的危机防范机制，以减少自我保险的需要，促进释放发展所需的资源。

90. 正如 Argüello 大使所指出，我们需要向前迈进，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有效地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多边金融援助工具(灵活地予以执行)。执行这一战略必须要求金融部门改变行为，由于金融部门没有发挥好作为储蓄和对社会有益的投资两者之间中介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是最近数十年中逐渐孕育而成的，如果多边贸易、货币和金融机构履行了自己的使命，这场危机就不可能发生。相反，这些机构并没有对正在形成的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提出警告，没有在必要时呼吁进行改革，而是推动实施一系列扭曲的规则，对金融市场放手不管。

91. 建立 20 国集团，作为对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进行监督的论坛，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机构的改革。即将实行的改革必须导致消除否决权，并且大大增加发展中经济体对资本、投票权和决策方面的参与。

92. 透明度是发展效力至关重要的因素。但长期以来，世界银行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许多发展项目的构想和执行都很糟糕：有些大坝毫无必要地造成民众流离失所，更加贫穷；砍伐森林，修筑道路，如果听取外界的声音，就不会作出有些决定。

93. 1993 年，世界银行为了改变其运作方式，而且外部压力下，采取了一种较为开放的披露政策，自此以来，变得越来越开放。最近，董事会批准了一项新的信息开放政策，除了少数明确界定的机密文件之外，将公开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有关世界银行交易的几乎所有其他文件。实施这一历史性的措施将需要有新的系统、

新的技术和新的工作人员。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迅速地获得以他们自己的语文提供的、关于更多项目的更多信息。世界银行希望，这一政策将帮助他们更多地参与处理与他们有关的各种问题，从而帮助世界银行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果。

“你知道吗，柬埔寨每个男子、妇女和儿童都欠国际金融机构 193 美元？”
[1990 年代后期]

柬埔寨学生，Peter Stephens 引述

94. 这种新方法有两个关键概念作为依据。世界银行承认自己负有重大责任。它可以影响到数百万人的生活，因而有责任向民众通报自己的工作，而且听取民众的意见，了解民众希望它开展哪些工作。第二个概念是谦逊的态度。世界银行最近学到的东西之一是，它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今后，世界银行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参加讨论的一方；有时候自己坐在后排，让各国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指导，告诉它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它的有些干预措施才最为有效。

95. 议员们应通过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尽可能)，通过银行的当地办事处主任，或通过财政部(世界银行的法定对口部门)，在国家一级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展工作。正如 Stephens 先生所解释，执行董事具有双重作用，他们既要指导银行的工作，又要代表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他们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第二个作用。也鼓励议会和世界银行之间在全球一级开展互动，特别是通过世界银行议会网开展互动，同时也欢迎采用新的方式与各国议会联盟开展互动。

96. Griesgraber 博士以批评的口吻报告了基金组织的问责制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指出，管理部门、执行局或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都不对任何人问责。可能除各国政府任命的 8 名董事之外，基金的治理结构中根本不存在问责制。研究报告所提出建议的主旨是要有透明度和问责制。她建议议员们到这份研究报告的网站(www.thefourthpillar.ning.com)上了解更多信息。

97. 如果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要具有合法性，就必须建立问责制，她认为问责制由四个要素组成：评估，透明度，参与和外部投诉机制。此外，许多组织强烈认为，应该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密切地置身于联合国中，由大会、或可能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来制订它们的更多政策。然而，大国并不希望采用这种做法。相反，大国设立了 20 国集团，尽管该集团就全球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但在问责制的四个要素方面却没有进展。新的金融规则似乎应该由金融市场稳定委员会制订，但在委员会之外，局外人都不知道这些规则是如何产生的，是谁作出的决定，有什么表决规则，也不知道有关该进程的任何其他事情。

98. 20 国集团是一个自封的机构，世界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在该集团中并没有得到代表。必须让发展中国家发出更大、更明智和更加清晰的声音，并让议员们同样能参与，发表意见，并且知情。

讨论情况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确需要进行改革，包括在如何作出决定和由谁作出决定方面进行改革。议会没有充分参与。

参议员 Rosario Green-Macías

99. 在随后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认为，要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就需要加强多边监测和预警系统，开展深入的改革还应该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决策进程，以便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还应该包括透明度，将此作为这些机构增强绩效和公众问责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们应该赞成公开信息的做法，除非这样做会损害明确界定的保密需要。有了这种透明度，各国将更加信任国际金融机构。

100. 进一步协调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关系，将确保国际金融、经济和发展结构更加协调一致。这也将有助于调整国家和国际发展、货币和贸易政策。应该就如何从体制上更加紧密地将国际金融机构嵌入联合国系统开展研究。

101. 有人提出，对主要政府间组织的活动缺乏任何议会控制和后续行动，是造成全球化进程缺乏民主的主要因素。为应对这种缺乏民主的现象所采取举措的最佳范例是各国议会联盟和欧洲议会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的议会监督程序。在对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议会监督方面，各国议会联盟可以发挥同样的重要作用。Stephens 先生回答说，事实上，世界银行欢迎更多的监督。

102. 现在已经有 4 个小组在监督银行的活动，但如果要增加议会的监督，这个决定不应该由世界银行作出，而应该由各国政府通过其在董事会的代表作出。应该欢迎议会的监督，这尤其是因为对于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的工作似乎存在一些误解。例如，关于条件论，Stephens 先生说，2009 年的大多数新贷款都用于支持发展政策，这都是由政府决定和实施的。如果有任何条件，其实条件为数不多，也反映了政府的条件和政策优先事项。1980 年代的老式条件早已不复存在。议员们应审阅贷款文件，自己来加以证实，根据公开信息的新政策，这些文件都可以查阅。

103. 议员们还强调指出：

(a) 如果全球危机中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加强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强化所有国际组织之间开展密切合作的必要性。6 月份关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的会议的成果似乎反映出强有力的集体承诺。全球性问题需要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b) 必须深化这一年中 20 国集团和联合国会议作出的决定，切实控制住国际金融。显然必须对行销全球的衍生金融产品实行更多的监管；

(c) 议员们应该对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中的代表性。目前期望对发展中国家的配额所作的改善可能是不够的。此外，提高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的透明度，会增加各国对它们的信任；

(d) 应该让各国议会联盟在建立一个多边监督程序来监督布雷顿森林机构方面发挥作业。这种程序可以包括召开与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机构的会议相并行的会议。各国议会在国家一级同布雷顿森林的机构的关系中也应该争取有更多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e) 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要所有利益攸关者采取行动并作出调整。美国需要减少消费，出口国必须开发自己的国内市场，而不是依赖于美国消费者。此外，特别是中国需要放松汇率管制；

(f) 腐败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阻碍了许多国家的恢复工作。每一个国会议员都有责任打击腐败。

104. 听证会结束前，陈述了四次讨论会中提出的若干要点和建议。各国议会联盟主席在闭幕词中指出，讨论期间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反映出议员们对经济和金融危机问题深为关切。Gurirab 博士鼓励各国议会不要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接近结束而放松警惕，要继续努力开展切实可行的和转化性的改革。他建议进行更多的逆向思考，在了解我们目前的整个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情况时，尤为如此。他还要求所有与会者回国后更多地重视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需要。